

# 论新中国建国初期法与德的关系

赵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 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1966年,一位曾在中国考察了将近半年的一位外国人士卡罗尔在看到全中国都在学雷锋的现象以后感到极大的不理解“大家从雷锋故事中受到的教育是道德教育,而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而且,这样的事情也太过于平凡化,“雷锋式的好事无须费力,不要智慧谁都能做得来”。<sup>[1] (P240)</sup>但卡罗尔可能不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不仅仅在学雷锋——一个解放军的班长,甚至还学习普通的烧窑士兵,学习整个的解放军;他们不仅仅学习军人,还学习掏粪工人、普通的农民。这确实只是从最普通的人中进行学习,而且学习的也主要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但这种道德品质却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2] (P283)</sup>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共产主义运动要做到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可以说,这“两个决裂”在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或者说它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方向和努力实现的目标。列宁也曾讲到这种共产主义道德“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sup>[3] (P306)</sup>其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共产主义道德不断为新的原则和新的内容所丰富,成为真正的全民的道德”<sup>[4] (P402)</sup>,而其主要内容也逐渐固定了下来,“这个道德规则所包含的原则大概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诚实地为社会而劳动;集体主义和同志互助”。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将共产主义道德进一步集中化和具体化。这一点也是几乎所有中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所反复强调的一点,虽然有些观点在理解上可能并不准确或周全,如迈斯纳将其称为一种“苦行主义价值观”<sup>[5] (P112)</sup>,斯塔尔将其概括为五条伦理原则“大公无私(或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坚忍不拔、诚实、忠诚。”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论

述在延安时期所写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中都有所体现。他在同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此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此也有多次的论述。他在这些论述中主要讲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塑造,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即可以完全地抛却个人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或小团体意识,而代之以献身于集体、服务于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体现不因身份、地位、职业甚至学识程度而有所区分,而往往在最平凡的人的最平凡的事情上得到最真切的反映。实际上,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这些主要的领导者们不仅是如此的论述、提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如此的践行,在很多方面为整个社会做出了榜样。薄一波曾经回忆到:新中国开国大典刚刚开过之后,一位湖南亲戚因为在当地的个人任职问题上请求毛岸英的帮助,但毛岸英在对新旧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一番细致化的分析以后对之婉言拒绝了。

##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法制建设中的体现

建国之后,党对于各类机关、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向非常重视,政法系统内则更是如此。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和政法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清除旧法思想;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司法工作“大跃进”则主要要求司法工作作为总路线服务;1963年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强调司法干部的革命化。1963年、1965年、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分别号召全体法院干警开展学习雷锋、王杰和焦裕禄的运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当时专门曾经赋诗来赞赏雷锋和焦裕禄,其中分别提到“所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利人如不及,往我若无情。路线依群众,方针视斗争”。1965年,《政法研究》杂志专门召开了“关于政法干部革命化问题座谈会”,会议提到“政法干部更加革命化的要求,从总的方面说,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以实现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群众化,非常斗争化,全心全

[作者简介]赵春燕(197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社会学。

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司法》1966年第1期在社论中讲到：“突出政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司法干部的头脑，树立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的思想，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的因素第一，有了一支革命化的司法队伍，法院工作才能全盘革命化，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在司法战线上的光荣任务。”

这种理想道德建设的强调对当时法制工作的影响，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法官或调解人员的素质或资格而言，更为强调的是其思想品质和政治素养，而职业经历以及专业知识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如当时法院系统内进行推广学习的典型情况基本上均如此：广西横县百合人民法庭的审判员邓继祯初到法庭时是个对案件、文书，甚至人民来信都分不清的“门外汉”；贵州省仁怀县的卢德华在成为学习模范时到法院工作也只有一年多；最高人民法院1964年通报表扬的模范审判员韩继巩，农民出身，解放后曾被选为村长，之后在土改法庭任专职陪审员，1953年调县人民法院任审判员，1955年入党，之后曾被派送党校、干校进行学习，1957年以来，连续七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五好干部”。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当时干部来源的原因，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法院所补充的干部大多是一些工人、店员、荣退军人以及后来的从人民法庭选拔来的先进分子，审判知识只能靠逐步积累的司法实践和以往的社会经验。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审判工作本身对服务态度、工作作风等主观因素的强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退伍军人对审判工作的驾驭并不显劣势。在迈斯纳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中，曾多次提到建国初期所出现的多种手段与目的相背离的现象，如官僚制与平等、工业化与城乡差距等。但在稍后的论述中，他又注意到了毛泽东对此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毛泽东在共产党领导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按照自己的意愿，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矛盾的人”。而这种解决的方式，本文认为就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问题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通过此方式，党基本上正确解决了军队的建设问题，——即军队只是作为革命或建设的工具使用而不使其本身成为目的，如军阀；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党也基本上解决了党本身的问题——即党是作为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所以，对于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官僚机构的建设和改造而言，思想道德性的问题当然在开始就是位于第一位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卡罗尔疑问的一个解答。

其二，这种道德意识的强调与型塑极有利于在社会大众中建立共识。因为这种道德意识不仅仅致力于一种意识上的普遍认可，而且其本身的内容，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一种行动和认识上的统一性。而这一点对于消除纠纷中的分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解纷过程中，如大多数的调解、部分的审判活动甚至还包括对罪犯的监督改造，最为困难的就在于对共识的寻求。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随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推广，一个高强度的、弥散性的共识层次得以迅速地形

成。而其不仅仅在当时的主导性组织中，如各级国家机构中是如此，实际上即便很基层的自治性的组织中，甚至是家庭中也是如此。如当时的一部人民公社简章中即规定“公社要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依靠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开展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评比，逐步使‘各尽所能’成为每个社员的自觉行动。”借助于这种可以通约的共识，法院或各级调解组织不仅可以较为轻松地处理常见的打架斗殴、侵权纠纷事件，而且一些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的山林、用水纠纷也可顺利地得到解决。他们在“处理山林纠纷时必须十分注意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与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思想进行斗争，树立起集体的、协作互助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旱情严重的情况下，政法工作人员通过集体观念、全局观念的教育，不仅能够迅速地解决抢水纠纷，而且各生产队顾全大局，将各自的抽水机集中起来统一地服从调配使用。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本年度的工作安排中专门针对此类纠纷的解决做出指示：“当前个人与集体之间有关山林、水利、土地、房屋以及生产资料的纠纷有所增长。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在处理时应当首先注意维护集体的利益，同时要依法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方面涉及到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争执，往往不是法院单纯依靠审判所能解决的，在党委责成法院参与处理时，法院应积极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根据党委的决定处理。”

其三，在政法系统中由此产生的内部激励机制上也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当时主要是一种“争先创优”的绩效体制。如在“大跃进”之后，河北某地的法院已将竞赛、评优制度化，“具体作法是：一月一小结，一季一评比”，评比的内容是“比质量；比数量；比经验；比效果；比劳动；比思想；比先进”。1962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本年度的先进工作者大会，“到会代表表示，一定要实现领导的要求，永远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螺丝钉”。“会后，不少基层法院积极贯彻了会议精神，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高潮。”不仅如此，各地执法机关还与本职工作相结合或不限于本职工作地积极开展了多种爱民活动。1958年7月，公安部在第九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决定将今后每年春节后第一个月作为全国公安部门的“爱民月”。1959年春节，在第一个“爱民月”活动中，《人民日报》专文进行了报道。1960年，广东省汕头专区各地人民法院和基层调处委员会也广泛开展了爱民活动，他们共为群众办好事136270件。辽宁省沈阳市的121名法院干部还利用星期天为群众做好事，他们到车站接送旅客、深入民宅清扫垃圾等。另外，各级地方法院在一段时期内也纷纷号召和报道法官进行扶危济困活动。

其四，这种长期的道德教育的推行大大地增强了社会的同质性，或者说是易于形成和扩大一种主体间性。一方面，不仅政法系统以及其他所有的机关干部之间的等级差距在缩小，而且其与系统外的普通群众之间的差距也在大大地缩小，这种同质的结果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减少社会冲突；另

一方面,司法干部接近生活也有助于其深度了解社会、解决矛盾冲突。如前文提到的模范审判员韩德巩为了解决矛盾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长期有效的办法就是“四同”,即与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

### 三、法与德关系的同化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除了这种积极的社会效果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种将法律与道德简单趋同化的做法也极易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或者相关的法制运作上的障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中国曾经广泛地出现了一种“爱国公约”的社会规范形式。“社会主义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运用自己力量解决问题的一种良好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的形式在其产生之初就预设了一定的矛盾或适用上的限制。总体而言,公约的内容源自于生活习惯,具有很强的道德意义。这种道德习惯虽然也有着一定的规范性,但与严格的法律规范相比毕竟有着很大程度的差别。其内容上较为模糊,在一定意义上不适合进行成文化的规定。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有的地方规定的“升国旗要立正”的内容,1959年有的地方规定的“做到时不空过,路不空行,达到人人红勤巧,个个高工效”;其在形式上往往不太稳定,易于变化,即便是在一定的会议上通过群众民主讨论的方式所产生的公约也不能完全保证其日常的生活态度会与此完全一致,而如果不能做到随时地根据个人态度进行变化,实际上它就不可能是完全的“自觉自愿”。再则,这种道德性的规范如果通过民主讨论、自我批评、评比竞赛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它可以极大的促进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但如果与较为严肃或严格的制裁手段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制。比如当时的河北怀来县调处委员会在实践中拥有六权:批评教育;责令道歉;扣留赃物;决定退赃赔偿;决定具结悔过;扣减劳动工分或罚三日以下的劳动。其中第三、四、六项的处理要“由调处委员会或小组成员半数以上的人研究决定。”“他们处理的方法是:大部分教育,部分批判,严重的贴大字报与群众辩论相结合处理,屡教不改的不良分子给予处罚”。所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美援朝时期,在需要尽快地极大程度地调动其全民的参与的积极性而言,爱国公约的提倡和推动是完全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做法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凝聚社会力量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社会形势发生一定变化之后,尤其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道德很难起到或者代替法律对社会进行规范的作用。

另外,这种道德泛化的趋势对实践司法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将人民法院的工作概括为审判工作、调解工作和宣教工作三方面。对于宣教工作,他论述道,“审判工作人员应尽可能地利用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去向当事人和听众进

行法纪宣教工作”。客观而言,这种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人们了解法制、达成共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利益上的不同关切,共识的达成就会变得较为困难,进而会对司法中的宣教任务的执行带来不利的影响。1956年6月,因为群众对一起因离婚而引起的凶杀案件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就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哄闹。不过,当时的审判人员所总结的教训仍然是“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是,不能光管结案,还必须结合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1957年,江苏省南京、无锡等地又发生群众哄闹法庭的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要求“法院干部认真克服简单生硬、采用压服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对法庭旁听群众的法纪教育。”实际上,在此问题上,表面上的法制宣传和群众意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律和道德两种不同规范之间的分歧。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明确、一致的认识。如在今天中国的法学理论中,就已经将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作了明确的区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确的区分,法律表现为规范性文件,道德则主要表现为社会舆论;两者在违反的后果上不同,法律违反的后果是法律责任,道德违反的后果主要是舆论谴责;两者调整人们行为的方式也不同,法律主要是通过权利或者是权利义务的结合,而道德则更为强调义务;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法律侧重于外在行为,而道德则侧重于内在动机;另外,在构成上道德也没有法律那样严整的规范结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哈特在与美国富勒进行的论战中对道德的特殊性也有了充分的认识。他强调到:首先,“道德准则是在与它们所限制的强烈的感情冲动的对抗中得以维护,并且是以牺牲相当多个人利益为代价的”;其次,在道德上表现了重大的社会压力;再次,它体现在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中。<sup>[6]</sup>根据这种主张,道德较之于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本、影响更大的规范性意义,而同时对之进行的使用也需要非常慎重。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极力强调法律系统的自我封闭性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提到:如果由法官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诊治的角色,这不仅有害于法律的安全性,而且对司法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

#### 参考文献:

- [1][法]K·S·卡罗尔.毛泽东的中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苏]彼·斯·罗马什金,等.国家和法的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63.
- [5][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王 飞